

大学之道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大学使命

■武汉大学校长 李晓红

党的十八大报告是一份全面回顾成就、系统总结经验的报告,也是一份规划蓝图、引领未来、凝聚人心、增强自信的报告,报告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新突破、新境界,也启迪着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列为指导思想顺乎时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非凡的发展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世界经济版图已然改观。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文明模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深切关注。这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是完全适应中国国情的,有着强大的旺盛生命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科学发展观正式列入党的指导思想,这一决定顺乎时势、顺应人心,必将使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统一、锐意进取、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走改弦易帜的邪路。这是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全国各族人民和子孙万代福祉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生命线,决不能有丝毫含糊。与此同时,我们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也应该适应这一趋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改进我们的思想和工作。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要求我们把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如今,“中国制造”已成为世界经济一股重要的力量,中国的基础工业产能大多名列世界前茅,但是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式基本上还是依靠资源的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这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现在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用科技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

为此,我们要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这方面,高校要不断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主动向企业靠拢,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强



有力支撑,促进产学研用的深度合作,让新的科学发现与市场信息在第一时间能够融合,充分发挥人才、技术与品牌优势,吸引社会力量,推动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

推进美丽中国 高校大有作为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要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着眼长远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历史使命感。

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报告明确提出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一系列举措。而在这些举措的实施过程中,高校应该有所作为,也完全可以大有作为。比如武汉大学在资源与环境科学、生物工程、测绘遥感信息工程、环境法等学科领域都具有一定优势,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学校学科和人才优势,主动瞄准生态文明建设所需

的、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开展协同创新研究,着力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提供人才与科技支持,切实履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中大学应承担的使命。

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还需要进一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我国已经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但要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始终坚持内涵发展、创新发展、特色发展、国际化发展,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这是全国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当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大师的精神与学术影响,往往与学校的历史积淀及学术基础熔于一冶,锻造出学校独特的气质、魅力、文化与学术底蕴。

大师是大学魅力的最佳展示

■郑若玲

们。如在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正式注册的学生自然常可沐浴名师“春风化雨”之教导,许多游学者、考试族或周边高校的学生,也会在所倾慕的学者课堂上旁听“蹭课”、各有收获;在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厦大,抗战前夕临危受命担任校长的萨本栋先生,不仅科技成就享誉海外,而且在教学上“身先士卒”、病榻授课,工作上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抗战八年厦大内迁长汀,虽惨淡经营,得蒙萨公披荆斩棘、呕心沥血、竭诚奉献,以身垂范,学子们无不为之感泣,使长汀时期的厦大形成了勤奋、朴实、严谨、和睦的好风气,校务蒸蒸日上,学生业绩斐然,成为“南方之强”。

不过,因无缘与大师同处一期而间受其教,又何尝不是福气?大师已矣,精神永存。大师的精神与学术影响,往往与学校的历史积淀及学术基础熔于一冶,锻造出学校独特的气质、魅力、文化与学术底蕴。学子们浸润其间,耳濡目染,受教于无形,大师之精神得以薪火相传,大师之学脉得以延续承继,大学之魅力也因此长久葆存。

这一消息令舆论很不解:自主招生提出这么高的学业成绩要求,这样的改革还有何意义?这些排名重点高中前1%的学生不需要自主招生,照样可以进名校。北大、清华如此操作不过是“抢生源”,而且也在自主招生中重复与高考一样的选拔标准。

舆论的不解源于误会了我国高校正在推进的自主招生,以为高校的自主招生建立了多元评价体系,会给一些偏才、怪才以进入大学的渠道。其实我国目前的自主招生,其实质根本就不是自主招生。目前自主招生操作的流程是,考生先要参加学校的笔试、面试,获得自主招生资格后,还要参加高考,填报志愿,必须把该校填报在第一志愿(传统志愿填报)或A志愿(平

当然,大师魅力不是仅仅存在于著名大学之中。任何一所大学,都有其独特的历史、精神与校园文化,也各有不同领域、专长、品质的学者专家。广义的“大师”,并不仅限于有杰出学术成就或卓越社会贡献者,许多平凡的大学教师,以其敬业的精神、认真的态度、高尚的品德、端正的学风,默默深耕于教书育人岗位,作出的业绩看似无名无利,实则崇高非凡。

值得一提的是,梅贻琦先生不仅有广为人知的“大师论”,还有一个富有教育智慧的“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从游论”包含的思想有三:其一,教育的价值不仅在于知识技能的传递,而且甚至更重要的在于为学生的身心修养、意志锤炼与情绪养成等营造氛围、树立榜样,即“身教重于言教”;其二,学校良好氛围对于人才培养与熏陶之重要性;其三,教师学识与人品即“经师”与“人师”的和谐统一、师生之间的亲密无间,对学生具有重要影响。可见,梅先生的“从游论”是对孔子的“身

要牢固树立立德树人的理念,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这方面,武汉大学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传统、积淀了丰富的红色资源。近年来,学校以校园红色文化育人为特色,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为主题,以传承和弘扬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为核心,注重发掘、整理、开发和利用学校特有的红色文化资源,以课堂教学、主题实践和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育人优势,激发了学生追求进步、全面发展的动力。

总之,党的十八大报告高瞻远瞩,包容丰富,论述精辟,是指导我们工作和行动的指南,我们要充分发挥学校专家学者的人才优势,对十八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行深入研究解读,并引导广大师生自觉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

圣洁的“象牙塔”形象曾是很多人心中对于大学的唯一定义,即使大学出现一些问题,公众也多以爱护和宽容为主流。然而近几年,这一状况似乎有所改变,关于民意与大学之间的博弈已经多次上演。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年八月份,前北大教授邹恒甫指控北大院长系主任强奸酒店服务员事件曾引起广泛社会关注。回顾整个事件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尽管直到今天,邹恒甫也没有拿出任何指控北大的证据,但大部分公众在对待北大与邹恒甫的态度上,几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信任后者,一面倒地北大乃至中国高校进行痛骂和批判。

空穴来风何以致大学遍体鳞伤?

在这样一个并无确凿事实依据的负面新闻的持续发酵中,曾经神圣的北大乃至中国高校的社会声誉和形象轰然坍塌,与之相伴的,一是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通过操控舆论轻而易举地成为所谓反体制的“斗士”,二是满怀道德优越感的网民在情绪化的愤怒中成为不问真相的网络“哄客”。至于事实真相如何这一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在舆论持续发酵中反倒渐渐蜕化成为一个貌似毫不相干的背景。

大学形象如同惊弓之鸟,在一片片空穴来风中遍体鳞伤。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件很悲哀的事情,但它绝非毫无缘由,而是出自一种日积月累的蚁穴效应。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百废俱兴的上世纪80年代,大学给人们突出印象是崇尚自由;在市场经济风起云涌的上世纪90年代,大学给人们突出印象是更加功利实用;在规模扩张的新世纪初,大学给人们突出印象是行政化加剧。

毋庸讳言的是,这样一种形象更迭过程中,大学本身所能传递给青年学生和社会大众的学术理想与文化精神方面的正能量在不断减少。相反,大学对社会风尚的亦步亦趋,大学师生的功利、浮躁,大学自身的市场化、行政化趋势加剧,以及由此引发并屡屡曝光的论文抄袭、成果造假、教授言辞出格、学者为利益集团代言、导师让学生打工、招生基建腐败等等负面新闻,正在潜移默化地消解着社会民众对大学的敬意与憧憬。

当然,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的高等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进步与发展无疑是全方位的,成绩巨大。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但是,发展过程中所滋生和蔓延开来的各类腐败、功利、浮躁等问题和现象,也确实给公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正是这样一些负面的认识和理解,积聚到一定程度后,便开始左右人们对于大学的思维和判断。

从这个意义上讲,网民在类似事件中表现出的非理性思维和起哄现象,与其说是偏听偏信、不明是非,莫如说是反映了民众对大学形象的集体性逆反心理——其实,人们并非丧失了追问真相、谈论是非的能力和素养,而是恨铁不成钢,更愿意相信大学确实存在各式各样乃至匪夷所思的丑闻。

大学应如何回应民意倒戈?

大学形象其实是大学对社会的形象塑造和传播与公众对大学的形象接受和想象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要塑造美好的大学形象,大学不仅要关注自身的形象表达,更要关注公众对于这种形象是否接受、是否认同。

由此,我们还能不思考一个问题:大学形象在民众心目中不断坍塌,大学应该如何回应民意的倒戈呢?在这方面,大学似乎一直存在着热情不够、积极性不够、能力与智慧不足等问题。典型的表现形式是,面对有损大学形象的负面新闻和舆论批评,或漠不关心、视若无睹,或护短袒护、缄口不言,或心存侥幸、鸵鸟心态,或缺乏辨别、进退失据,或观念陈旧、处置不当,或随声附和、信口开河,或恼羞成怒、激化矛盾……诸如此类的表现形式,不仅无法化解危机、挽回形象,反而因为容易刺激公众情感,而给大学形象带来更大的伤害。

大学之所以在回应民意倒戈方面乏善可陈,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大学普遍存在功利实用的价值观,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热衷于向社会展示征地、新建、扩招、升格、争经费、拉项目等等物质层面的进展,而漠视了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核心价值的持守,因此大学形象的塑造和表达比较难以令社会公众接受和认同;二是大学的行政化趋势、市场化风气日趋严重,由此造成大学在教学科研、教务管理、社会服务、招生基建等诸多方面较大面积地出现腐败、官僚、功利、浮躁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从而造成社会舆论持续不断的曝光和批评,导致社会民众对于大学精神失落的质疑、焦虑乃至愤怒;三是大学未能与时俱进,及时妥善地调整好大学与民众、大学与社会舆论之间的关系,依然保持着过去那种居高临下、我行我素的强势心态,既没有在战略上构建起积极应对舆论危机的策略与机制,也没有在战术上形成随机应变的娴熟的应对技巧,从而在蜂拥而至的舆论倒戈面前进退无措。

可以想见,一方面是大学自身的形象塑造难以得到社会认同,且各类负面事件难以遏制地不断曝光,一方面是大学在危机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缺失,由此导致的民意倒戈和大学形象的坍塌,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笔者认为,要挽大学形象于既倒,大学应该认真对待并妥善回应民意:一要坚守大学之道,不断锻造科学、民主、自由、创新的大学文化,积极主动地向社会和民众进行持续不断地传播;二要正视并切实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腐败、功利现象和问题,加强制度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阻塞漏洞,防微杜渐,从根本上化解大学行为失范的问题;三要深刻认识到大学已进入社会经济发中心地带,其言一行都须在阳光下接受社会评判的现实,克服过去那种面对危机事件无动、侥幸、护短、瞒骗、急躁、怨恨等不良心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价值至上”、“预防为主、协同应对”的危机管理意识,立足于真诚沟通和快速反应,努力通过妥善处理突发事件本身来降低损失、维护大学形象,乃至借势反弹,提升或重建大学形象。

大学形象：民意倒戈与大学的回应

■蒋家平

一所大学,魅力何在? 对此问题,早在1931年,民国著名教育家、被誉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与百年清华史上“四大哲人”之一的梅贻琦先生,便在职演讲中道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振聋发聩的教育名言。时至今日,这一论断仍深为世人所推崇。而笔者也深以为然。

事实上,提出“大师论”的梅贻琦先生本人即是一位学产品高的大师。梅贻琦是天津南开学堂首届学生,也是清华招考的首批留美公费生。1914年自美国著名科技大学伍斯特理工学院毕业回国后,梅贻琦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62年病逝台湾。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素有“驱逐校长”的传统,梅先生却能稳居教职达31年之久,成为国立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这一历史纪录之创造,别无他因,在于梅先生乃“中西合璧真君子”也。

执掌清华后,梅先生便遵照其“大师论”,千方百计广揽英才,一时间,清华园大师云集,赵元任、陈寅恪、潘光旦、吴宓等各领域之翘楚,均在梅先生掌校期间执教于斯。大师的最大特点是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知识丰富、文理皆通,其时,清华奉行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纪念碑中所撰“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之办学原则,施行“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的通才教育,致清华园钟灵毓秀、精英辈出,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正是梅先生的雍容揖让、清正不苟、求真务实与执著坚持,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使清华建校不到30年便蜚声海内外,也有了今日之木水清华。诸多大师的存在,正是清华园散发出独特精神魅力之源头。

海内外任何一所大学之魅力,无一不因其拥有一批在学问、产品、思想、人格上有魅力的大师。梅贻琦、陈寅恪等大师之于清华,蔡元培、胡适等大师之于北大,张伯苓、陈省身等大师之于南开,竺可桢、钱三强等大师之于浙大,林文庆、萨本栋等大师之于厦大……便是对“大学的魅力在于大师”论断绝佳的例证。时至当代,国内许多著名大学为莘莘学子所追捧与推崇,仍因有一批才高八斗、品学双馨的著名专家学者,如季羨林之于北大,启功之于北师大,程千帆之于南大,刘道玉之于武大,杨叔子之于华中科大……

有缘与大师、著名学者身处一校,亲沐其教是一种福气。大师或著名学者,常能以其渊博的学识、开阔的眼界、睿智的思想、宽广的胸怀,影响一代代或受业其门或私淑其下的学子

行志愿填报),高考成绩达到高校承诺的录取优惠方能被该校录取。按照这一操作,考生的选择权并没有增加,自主招生还和高考集中录取嫁接,自主招生必定成为高校抢生源的手段。

这就是北大乐于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原因,在2010年该制度推出时,北大还宣称这是给中学校长推荐权利,可以发现一些“怪才”,可说到底,这是把学校的高分学生提前揽到学校门下,按照北大校长实名推荐的操作,获得推荐并通过学校面试的学生,必须承诺报考该校,这不摆明在抢生源吗?再就是,所有获得“校长实名推荐”资格的学校,实行的都是学校推荐,采用的都是以学业成绩为主的“综合指标”体系,因为一方面学校校长不愿意以教育声誉承担推荐责任;另一方面,大学还是以被推荐参加者高考成绩来评价学校的推荐是否得力。如果被推荐者参加高考成绩不高,甚至将影响到来年大学是否给这所学校推荐指标。

自主招生高校显然明白北大的真实用意,因此,在北大之后,清华、人大等高校推出的计划貌似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其实是让学生

更焦虑,在推荐阶段,就必须作出选择,一旦获得推荐,就不得再选其他学校。

正是由于学生没有选择权,所以北大、清华,把学业成绩的标准进一步提高,也就十分正常。这是自主招生与集中录取制度嫁接的必然。而如果实行真正的自主招生,情况就完全不同。自主招生的实质,应当是学校和双向选择,一名考生可以申请若干所大学,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作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可以提出基本的学业成绩要求,但如果其把成绩要求提得太高,就将很大程度上限制申请数量,结果是难以招收到适合本校的学生。在这种双向选择机制中,大学也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和招生标准,而不是所有学校都用一个相同的学业成绩标准去评价、选择学生。

2013年,我国高校的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将进入第11个年头,10年的自主招生实践,让高校的招生标准又回到分数原点,这值得深思。只有实行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才能推进高校转变观念,多元评价体系也才有望形成。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自主招生标准为何重回分数原点

■熊丙奇

行志愿填报),高考成绩达到高校承诺的录取优惠方能被该校录取。按照这一操作,考生的选择权并没有增加,自主招生还和高考集中录取嫁接,自主招生必定成为高校抢生源的手段。

这就是北大乐于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原因,在2010年该制度推出时,北大还宣称这是给中学校长推荐权利,可以发现一些“怪才”,可说到底,这是把学校的高分学生提前揽到学校门下,按照北大校长实名推荐的操作,获得推荐并通过学校面试的学生,必须承诺报考该校,这不摆明在抢生源吗?再就是,所有获得“校长实名推荐”资格的学校,实行的都是学校推荐,采用的都是以学业成绩为主的“综合指标”体系,因为一方面学校校长不愿意以教育声誉承担推荐责任;另一方面,大学还是以被推荐参加者高考成绩来评价学校的推荐是否得力。如果被推荐者参加高考成绩不高,甚至将影响到来年大学是否给这所学校推荐指标。

自主招生高校显然明白北大的真实用意,因此,在北大之后,清华、人大等高校推出的计划貌似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其实是让学生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